

## 1-7 唐代黑陶鉢雜識

頃讀安家瑤新作〈唐代黑陶鉢考〉。文中指出，紐約大都會博物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亞洲藝術部收藏的一件原定為河南龍山文化的黑陶鉢，其實是唐代的作品，並列舉長安西明寺和青龍寺遺址出土的同類標本結合佛教經籍的記載，認為該類黑陶鉢應與佛教僧尼用鉢有關。<sup>1</sup>我以為這是很有見地的看法，但同時感覺到安文所強調指出的「對於唐代的黑陶，此前沒有正式的報導和研究」，恐與事實略有出入，有失公允。鑑於此種黑陶鉢極有可能是和佛教僧徒密切相關的重要文物之一，故在此試做補充。

就個人見聞所及，這類黑陶鉢早在1920年代由國立中央研究院進行的安陽考古發掘中已曾出土。<sup>2</sup>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類似的黑陶鉢於考古發掘中亦屢有發現。除了安文所提及的長安西明寺（圖1）、<sup>3</sup>青龍寺<sup>4</sup>等兩處遺址之外，著名的陝西臨潼慶山寺舍利塔基精室（圖2），<sup>5</sup>以及在禪宗史上佔有關鍵地位的南宗七祖神會（684—758）身塔塔基也都



圖1  
黑陶鉢  
中國陝西省西安西明寺遺址出土



圖2  
黑陶鉢 中國陝西省臨潼慶山寺舍利塔基出土（謝振發攝）



圖3 黑陶鉢 中國河南省洛陽神會身塔塔基出土

出土了黑陶鉢（圖3）。<sup>6</sup>其中，安陽墓（YM226）出土二件，神會身塔塔基三件重疊置放，其和近年河南登封法王寺二號塔地宮出土的五件大小相套的黑陶鉢（圖4）<sup>7</sup>形成對照。從慶山寺伴隨出土有屬於八世紀前半時期的唐三彩，結合豎立於精室甬道的「上方舍利塔記碑」紀年銘文可知，慶山寺舍利塔基黑陶鉢的年代應在開元二十九年（741）之前不

久。另據神會身塔塔基下石室東壁石板內側所刻塔銘，載荷澤大師神會在乾元元年（758）奄然坐化，並於永泰元年（765）入塔。姑且不論身塔塔基中包括黑陶鉢在內的法器是否確為神會生前傳道所用，<sup>8</sup>然其為八世紀中期前後遺物，固無疑問。

慶山寺、法王寺和神會身塔的黑陶鉢造型均呈斂口、深腹，圓底無足。在發掘報告書出刊之前數年，神會身塔黑陶鉢曾赴日本展出，當時以為器表髹亮漆，故光可鑑人。<sup>9</sup>但此後的正式報告書則認為器表的光澤是經打磨拋光所形成。至於慶山寺的黑陶鉢，報告書認為是施罩一層光亮的黑釉。我雖未能目睹實物，但僅就圖片觀察而言，上釉的可能性並不



圖4 a、b  
黑陶鉢  
中國河南省  
登封法王寺  
二號塔地宮  
出土

大。如果將神會身塔黑陶鉢（同圖3）與長安西明寺黑陶鉢（同圖1）或青龍寺唐代層位出土的同類作品進行比較，<sup>10</sup>其不僅造型雷同，並均於器表施加磨光工藝。因此，我同意具有相同造型及類似製作工藝的大都會博物館藏品應屬唐代作品。不僅如此，近年出現市肆被定為龍山文化的黑陶鉢，<sup>11</sup>也應屬唐代遺物。從可判明墓主身分或遺址性質的出土例看來，黑陶鉢確實是與佛教有關的文物；建造於顯慶元年（656），毀於唐末戰亂的長安西明寺遺址出土的上刻「阿難」二字的同類黑陶殘鉢



圖5 「阿難」刻銘黑陶殘片  
中國陝西省西安西明寺遺址出土



(左) 圖6 銅淨瓶  
 (上) 圖7 銅手爐  
 (右) 圖8 銅塔形頂高足盒  
 中國河南省洛陽神會身塔塔基出土

片(圖5)也說明了這一點。神會身塔塔基除了出土黑陶鉢之外,另發現有銅淨瓶(圖6)、長柄手爐(圖7)和塔形頂高足盒(圖8)等法器。無獨有偶,1980年代於河北晉縣發掘的一座唐代中期墓葬,既出土了銅淨瓶,更伴隨發現一件器表亦經磨光的黑陶鉢(圖9)。後者造型和神會身塔所出者完全一致,據稱出土時鉢內尚遺留有「草藥」痕跡。<sup>12</sup>依照前述黑陶鉢出土遺址性質來推測,我們有理由相信,晉縣唐墓的墓主很有可能就是僧侶,至少是與佛教頗有淵源的教徒。其次,由於同墓伴出之報告書所謂「石藥碾」之形制和西明寺遺址出土「石茶碾」自銘碾器一致,<sup>13</sup>可知「石藥碾」其實是茶碾,其和同墓所見之瓷注和瓷碗應屬一組茶器,而唐代僧侶亦有飲茶之風。<sup>14</sup>設若上述推論可以成立,就可為出土有類似遺物組合的佚名墓葬提供判斷墓主身分的參考依據。事實上,學界亦曾進行類似的嘗試,如江西省瑞昌所謂「唐代僧人墓」即是因其出土了青銅塔式盒、手爐、鉢和七彩枕形器。<sup>15</sup>瑞昌墓雖無黑陶鉢,僅見銅鉢,但從神會身塔塔基亦見造型相近的盒、手爐等器物組合,可以認為「僧人墓」應屬可信的推論。如前所述,1920年代由中央研究院著手進行的安陽發掘亦見兩座出土黑陶鉢的墓葬。兩墓出土器物內容雷同,即均以黑陶鉢、陶瓷長頸瓶和鐵製帶柄手爐為基本組合。值得一提的是,參與當時發掘工作的人員一致認為黑陶鉢為「僧侶用品」,並且依據人骨鑑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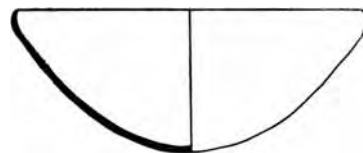


圖9 黑陶鉢線繪圖  
 中國河北省晉縣唐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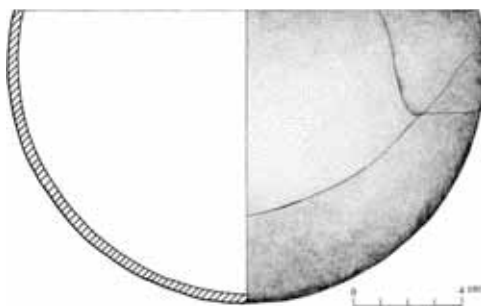
圖10 黑陶鉢  
中國河南省安陽隋至初唐墓  
(YM226) 出土



圖11 黑陶鉢 中國河南省隋至初唐 (YM344) 出土



圖12 「應量器」 銘紫砂陶鉢



推論出土兩件黑陶鉢（圖10）的YM226墓為女墓，即尼墓，僅出一件黑陶鉢（圖11）的YM344為男墓，即僧墓。<sup>16</sup>事隔多年，在今日看來，除了感佩老一輩的考古學家們心思之敏銳，也不得不對其鉅細靡遺的考古發掘記錄以及編者石彰如先生不掠人之美、如實陳述之胸懷致上敬意。從YM226灰陶長頸瓶和YM344白瓷長頸瓶之瓶式和1990年代發掘的安陽隋墓器形相近，<sup>17</sup>特別是白瓷長頸瓶和河北邢窯隋代製品器形一致，<sup>18</sup>推測YM226、YM344兩墓的相對年代應在隋代。這也就是說，僧尼以黑陶鉢入墓之葬俗的年代可上溯隋代。另一方面，雖然還缺乏具體的論證，不過慶山寺發掘報告書曾經指出，同塔基所出黑陶鉢或是毗舍離城上的貴重瓦器，為諸比丘得之，比丘不敢受用，而為佛所受畜物。此外，白化文則介紹了一件赤城縣文管所收藏的上刻「應量器」的紫砂陶鉢（圖12），認為是按佛法規定所製的僧人食鉢，持用者應受人天供養，因而也譯為「應器」，又因是應腹分量而食或應佛法之色、體、量，故也譯作「應量器」。<sup>19</sup>總之，以往學界雖尚未將出土的黑陶鉢結合佛教經典進行必要的考証，但已初步付出關心。我對佛教經籍雖是個門外漢，在此則擬在觀察該類陶鉢出土情況的基礎之上，嘗試提出一點外行人的看法。

## 二

眾所周知，鉢是梵語Pātra鉢多羅的音譯簡稱。明張自烈（1597—1673）撰《正字通》曾對此做出提綱挈領的記敘，載云：「鉢，食器，梵語鉢多羅，此云應量器，謂體色量三俱應法，故體用鐵瓦二物，色以藥煙熏治，量則分上中下，釋氏皆用鐵，形圓，上有蓋，或用瓦，形亦如此。」言簡意賅地指明鉢的語源、用途、材質、尺寸以及呈色工序和大體的造型。其中，以藥煙熏製呈色的著色工藝，亦見於安文也引用的《摩訶僧祇律》所載：「世尊示土處，汝知示土，如是和，如是打，如是埏，如是熏。作鉢熏作鉢，成就已作三種色，一者如孔雀咽色，二者如毗陵伽鳥色，三者如鴿色。佛言，熏時當伺候使作如是色。」安氏認為上三種瓦鉢的呈色應是綠、紅（？）和黑色。前述唐代遺址出土的煙熏磨光黑陶鉢即為較常見的一種，赤城縣文管所藏「應量器」銘紫砂陶鉢是否呈紅色調？仍有待求証。不過，流傳於世的文物中曾見於釉下陰刻「敕建拈花禪寺」銘文的和唐代佛門有關的絳紅釉陶鉢（圖13）。從而可之，唐代僧尼用鉢也包括部分施釉作品。其次，《正字通》或《十誦律》等都提到，應量區分有大中小等三種不同尺寸的鉢形。有趣的是，南宗七祖神會和尚身塔塔基出土黑陶鉢亦為三件。其形制、胎質均相同，僅大小尺寸各異，出土時重疊相套置於一處。雖然神會身塔塔基出土的黑陶鉢似乎可證實文獻的記載，可惜我們仍舊無法理解登封法王寺二號塔地宮出土五件黑陶鉢的正確意涵。

另一方面，慶山寺塔基除了出土一件黑陶鉢之外，另出土四件裡施白釉，外罩黑釉的斂口深腹平底瓷鉢（圖14）。這很容易使人聯想到四天王的奉鉢譚（圖15）。《大唐西域記》載：世尊在受二商人麩蜜時，四天王從四方來，各持金鉢以奉上，世尊以為出家不宜此器而不納受，並再三拒絕四天王奉呈的銀、琉璃、瑪瑙、珍珠等鉢，最後總算受納了紺青石鉢，但卻將其「重疊按為一鉢，其外則有四際焉」（卷八）。這一樣式的鉢，



圖13 「敕建拈花禪寺」褐釉陶鉢



圖14 內白釉、外黑釉陶瓷鉢  
中國陝西省臨潼慶山寺塔基出土



圖15  
「四天王奉鉢」浮雕  
日本平山郁夫  
シルクロード美術館藏



圖16  
「佛鉢禮拜」浮雕  
日本私人藏

是否會對唐代工藝品中的四稜裝飾產生影響？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不過，佛鉢的傳說或變遷，或許不失為是理解中國瘞埋陶鉢的可能線索之一。

桑山正進〈罽賓與佛鉢〉一文，雖然主要是討論中國南北朝時期罽賓國的地理位置，兼及《蓮華面經》的成立問題，但所引經籍中有關佛鉢的記事，卻頗發人省思，足資借用。<sup>20</sup>世尊遺留之佛鉢，自來是各國夢寐以求的聖物。〈馬鳴菩薩傳〉載：北天竺小月氏國王圍攻中天竺時，即要求以佛鉢和馬鳴來替代欲索求的二億金（《大正藏》五十冊，頁一八三）。佛鉢作為佛法興隆之象徵，著實也吸引不少中國僧人前往參拜（圖16、17）。自東晉法顯（？-418至423）以降，如後秦（384-417）智猛於奇沙國「見佛鉢，光色紫紺四際盡然」（《大正藏》五十冊，頁三四三）；南朝慧覽也「曾遊西域頂戴佛鉢」（《大正

藏》五十冊，頁三九九）。桑山氏考証佛鉢應是犍陀羅（Gandhāra）印度邊地創造出的聖物信仰，但於五世紀後半至唐玄奘（602—664）之間，由於社會局勢的混亂，佛鉢也隨之消失於布路沙布邏城中，以至於玄奘前去時只看到昔日安置佛鉢的寶臺。傳為那連提耶舍（517—589）譯之大乘經典《蓮華面經》卷下記述了佛教樂土罽賓國之象徵佛法興盛的佛鉢，因遭受寐吱曷羅俱邏王（502—542）的破壞，故佛法滅亡。

《蓮華面經》卷下提到罽賓國和寐吱曷羅俱邏破鉢，以及將鉢與碎身舍利託付彌勒，立四寶塔，重新光輝斯道（《大正藏》十二冊，頁一〇七七）。近代的學者多懷疑《蓮華面經》卷下的以上記述，應該是中國方面有鑑於寐吱曷羅俱邏在印度的種種暴虐行徑和犍陀羅的佛事停廢，在憂懼佛法隕滅的情況之下所創造虛構而成的。<sup>21</sup>川勝義雄也指出中國最早區分正法、像法、末法的人是

天臺宗集大成者智顛（538—596）之師南岳慧思（515—577），而慧思末法思想的形成，可能還與《大集經》的譯者，即傳《蓮華面經》的譯者那連提耶舍有關。<sup>22</sup>無論如何，末法思想在當時慧思等人中已經萌芽。做為末法思想的產物之一，曾具體地反映在日本平安朝（794—1185）中期以來的「經塚」。所謂經塚是基於末法之世，經典滅絕，為免五十六億七千萬年後，彌勒再世於龍華樹下說法時無經可用，故未雨綢繆，預先寫經埋藏。<sup>23</sup>歷來的學者一致主張，日本末法思想雖源自中國，但埋藏寫經營建經塚卻是日方的創舉。不過，前引推測譯出於隋開皇年間（581—600）的《蓮華面經》卷下由中國方面添加虛構之將鉢與碎身舍利託付彌勒的記事，似乎意味著要以佛鉢等世尊所遺聖物做為佛法東山再起的根本依據。如前所述，以黑陶鉢入墓正巧始於隋代。如果說在未法思想已然成形的唐代，僧尼們以此瘞埋方式來確保象徵性的佛鉢，也非不可思議之事。至於在《蓮華面經》中與佛鉢相提並論的佛骨舍利，更自然的會讓人憶起陝西扶風法門寺瘞藏的佛指舍利。據說釋迦牟尼（西元前565—485）八十歲於拘尸那迦（Kushinagara）涅槃，遺骨火化後分



圖17 「佛鉢禮拜」浮雕  
巴基斯坦喀拉蚩博物館  
（Karachi Museum）藏

與鄰近數國建塔供養，但佛指舍利於何時傳入中國？已不可考。值得注意的是，法門寺地宮也出土了四件金或銀鉢。器形均呈斂口、深腹、小平底，當中一件口沿外壁鑿「文思院准咸通十四年三月廿日勅令造迎真身金鉢盂……」等字銘（圖18），<sup>24</sup>說明



圖18 金鉢盂 中國陝西省扶風法門寺地宮出土

是咸通十四年（873）所製造。考慮到法門寺地宮寶物主要是咸通十五年（874）懿、僖二宗及惠安皇太后、昭儀、晉國夫人或諸頭供奉的供養物，故四件紋飾不盡相同的金銀鉢原本恐非一組。不過其大體造型則與開元二十九年（741）臨潼慶山寺出土的四件施釉瓷鉢相近，後者四件作品作風如出一轍，應為同組器。兩處地宮均出土造型、數量一致的鉢盂，應該只是單純的巧合，但法門寺「勅令造迎真身金鉢盂」銘文，卻也容易使人腦海再度浮現前述四天王奉鉢譚的情景。既然唐代黑陶鉢多出土於與佛教有關的遺址，並有瘞埋在寺塔地宮或身塔塔基的考古實例，因此，我們是否可以這樣大膽地設想，即：唐代瘞埋陶鉢之制，除了有做為僧徒身分象徵、不忘僧尼沿門托鉢為渡化眾生的涵義之外，或許還兼具對世尊佛鉢的聖物信仰，而後者可能又和末法的思潮有關。

### 三

綜合考古發掘遺物和流傳於世的作品，大體上可以將埋葬入墓的隋唐時期黑陶鉢區分為兩種樣式。I式造型呈斂口、弧身、尖圓底，從開元二十九年（741）慶山寺、永泰元年（765）神會身塔塔基等紀年資料看來，其似乎較流行於八世紀中期前後。長安青龍寺唐代地層I式鉢雖乏紀年資料，但同一層位（第三層）出土有屬於八世紀前半的唐三彩；<sup>25</sup>河南登封法王寺第二號塔基亦可從伴隨出土墨塊上之「天寶二年」（743）印銘得知，其相對年代約在八世紀中期之後不久。就目前的資料看來，其主要見於河南地區，但河北省亦見個別出土例。II式見於安陽隋墓，直口微斂、深腹、圓底。上述兩式鉢體均較薄，個別I式鉢鉢底較尖，有的據說還髹黑漆。<sup>26</sup>無論如何，相對於中國I式鉢器形幾乎只見於陪葬入墓的黑陶鉢，在日本奈良時期（710—794）鉛釉陶中，不僅可見到和I式鉢造型完



全一致的三彩或二彩陶鉢（圖19），亦存在有底部圓弧的綠釉圓底鉢（圖20）。

所謂奈良三彩是在唐三彩的影響下日本國產的釉陶器。從奈良縣日本神龜六年（729）小治田安萬侶墓已出土奈良三彩器可知，日本至遲在八世紀二〇年代已經燒造多彩鉛釉陶，其借鑑唐三彩的技法生產彩釉陶器的速度之快，令人驚訝。截至近年，日本國內自宮城縣以迄福岡縣計約三百餘處遺跡出土了奈良三彩和二彩器，其中又以奈良縣最為集中。<sup>27</sup>以遺址性質而言，包括宮殿、官衙、墓葬、聚落、祭祀址和寺院。其中近半數屬寺院和祭祀遺跡，明顯是和以寺院為主

的佛事、祭儀相關的文物，並且依儀式的不同而使用相異的器種。<sup>28</sup>日方學者早已指出，宮殿、官衙、寺院出土的奈良三彩器是於各祭儀中使用的。<sup>29</sup>這從奈良、平安朝文獻《造佛所作物帳》記載的「造瓷」既與天平六年（734）營建的興福寺金堂有關：《西宮記》或《江家次第》等平安朝文獻記錄宮中正月舉行的「御齒固式」乃是使用「尾張青瓷」等事亦不難窺知。<sup>30</sup>此外，又被稱為正倉院三彩的奈良彩釉陶，是因日本天平勝寶四年（752）東大寺所舉行的大佛開眼會等一系列佛事而生產的，後入藏正倉院。正倉院三彩器當中，還有在器底墨書「戒聖院聖僧供養盤天平勝寶七歲（755）七月十九日東大寺」的帶銘大平鉢，可知是聖武天皇（701—756）生母於宮中齋會所使用的用器。<sup>31</sup>因此，不僅奈良三彩有不少是與佛教儀式有關的器具，從部分彩釉鉢墨書銘文亦不難得知該類彩釉鉢應是於聖僧供養等儀式中所使用的。

長久以來，日方學者雖然一致同意奈良三彩會受唐三彩的影響，然而同時又主張，前者僅是模倣後者外觀上的繽紛施釉作風，其在造型方面則是借用了當時流行的響銅等金屬器。<sup>32</sup>這點亦可從奈良三彩器的淨瓶或帶蓋壺等器形，比較正倉院或法隆寺傳世的流行於



（上）圖19 奈良白釉綠彩陶鉢  
（下）圖20 綠釉陶鉢  
日本正倉院藏

奈良時期之中國金屬器，或從須惠器中倣自金屬器的作品也見有類似造型等跡象不難窺測得知。如前所述，雖然中國本土極少見到與 I 式黑陶鉢造型完全一致的其他工藝品，而陝西法門寺出土的金銀鉢器形雖與 I 式黑陶鉢有共通之處，但兩者之底部造型、特徵則不相同。因此，這就不能排除奈良彩釉陶中與 I 式鉢器形特徵極為近似的鉢類，可能與 I 式黑陶鉢有關。另從日本岐阜護國寺藏、於器式上屬 I 式的奈良時代金銅獅子唐草紋鉢看來（圖21），<sup>33</sup>中國可能原本亦存在有 I 式金屬鉢。無論如何，日中兩國所見 I、II 式鉢均屬三衣一鉢的僧具，其中外觀華麗的金鉢可能為佛前的供養器，而黑陶鉢則又可用來陪葬。歷來有不少學者主張，日本出土的唐三彩是由遣唐使所攜回，<sup>34</sup>而奈良大安寺講堂遺址出土的大量唐三彩標本也被認為是由隨遣唐使入唐的道慈律師所帶回。<sup>35</sup>姑且不論日本出土的唐三彩是否確由遣唐使節所攜回，這裡應該留意的是，隨粟田真人等遣唐使入唐求法的僧人道慈，於養老二年（718）歸國後，隨即在天平元年（729）倣長安西明寺遷造大安寺於平城京，故負責營建大安寺的道慈必然對西明寺的諸多情事知之甚熟，而西明寺既是玄奘講法、譯經的主要場所之一，也出土了陰刻「阿難」的黑陶鉢。事實上，我們從許多學問僧如永忠、空海、圓珍、圓載、真如、宗叡等均曾居住西明寺一事可知西明寺在日中文化交流史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其同時也是日方汲取唐文化的主要媒介之一。此外，倣為佛教密宗大道場的長安青龍寺也在密宗對日傳播中起了重大的作用，著名僧侶空海、圓仁、圓珍、宗叡等均曾受法於青龍寺。有趣的是，青龍寺也出土了黑陶鉢。這樣看來，奈良時期的彩釉陶鉢不僅在造型上與 I 式黑陶鉢一致，其多用於佛事祭儀的功能也和唐代黑陶鉢有共通之處，而出土有唐代黑陶鉢的長安寺院，又是日本僧人經常往返滯留之處。看來，倣為奈良彩釉陶器主要器種之一的三彩、二彩或綠釉鉢之燒製，極有可能是受到唐代黑陶鉢或促使唐代製作黑陶鉢之佛教思想的啓示。



圖21 金銅獅子唐草紋鉢 奈良時代 日本岐阜護國寺藏

## 小結

綜合以上敘述，唐代黑陶鉢無疑與佛教儀器有關。唐長安西明寺或青龍寺出土的作

品，透露出黑陶鉢曾被實用或陳設，但臨潼慶山寺、登封法王寺塔基或神會身塔塔基、晉縣唐墓等瘞埋例則不排除又與末法思想有涉。西明寺出土的上刻「阿難」字銘的黑陶鉢殘標本，是目前唯一的帶銘作品。阿難是釋迦的大弟子之一，這位在釋迦歿後與弟子撰諸經傳世的佛教長老，曾多次出現在由中國僞托的《蓮華面經》卷下世尊談及鉢破法滅的情節當中。如「身為國王名寐吱曷羅俱邏，而滅我法，此大癡人破碎我鉢。……阿難，以破鉢故，我諸弟子漸污淨戒」（《大正藏》十二冊，頁一〇七五）；「（佛告阿難）爾時我鉢及我舍利，從金剛際出，至閻浮提彌勒佛所」；「（佛告阿難）為我此鉢及我舍起四寶塔，以舍利鉢置此塔中，爾時彌勒佛及諸天人，阿修羅迦樓羅乾闥婆緊那羅摩睺羅伽等，大設供養恭敬禮拜鉢舍利塔等」（《大正藏》十二冊，頁一〇七七）。於塔基、墓葬瘞埋陶鉢，或許與世尊聖物崇拜或末法之埋藏習俗有關。

從中國出土黑陶鉢的器形、性質、年代，結合西明寺、青龍寺在佛法東傳時所扮演的角色，可以推測奈良時期所燒製的同式釉陶鉢，很可能是在同一思潮概念下的產物。不過奈良時期陶器似乎少見同式黑陶鉢，多屬褐、綠、白三彩或白釉綠彩以及單色綠釉陶。最後，我想說明的是本文若干觀點均止於臆測的階段，其中如有牽強附會、誤讀佛教經籍之處，皆應歸咎本人缺乏這一方面的素養。拋磚引玉，僅以本文做為問題的提出。

〔改寫自《故宮文物月刊》153（1995）所載相同篇名拙文〕